



→当下小文谈

现代化中的信仰重建与文明复兴



□叶小文: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。著名学者,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,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□叶小文

现代化推动全球化,经济正融为一体,空间距离在减少,生活水平在提高。可是:

——我们居住在新的,但却污染着的环境之中。

——我们的食品色香味俱佳,但却充满添加剂或转基因。

——各种各样好工具使生活变得既便利又复杂;无处不在的通讯网络,快速更新的电器电脑,眼花缭乱的电影电视,使生活既丰富多样,又复杂多变。

——人类总体绝对生活水平在日趋提高,相对差距却在日趋加大,绝对贫困化仍在蔓延。

——人类的总体平均寿命在生命科学的进步中延长,但个体的感受不幸和痛苦却在同步增加。

——人们跑得更快,声音传得更远,看见的东西更多,移动的幅度更宽,变成满身都是机器的血肉之躯。人们的精神却缺少了关照。

——人们拥挤在高节奏的、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。人心蠢蠢欲动,没有片刻安宁。欲望在吞噬理想,多变在动摇信念。心灵、精神、信仰被抛弃,被物化。物质的发展,让心灵迷失。当代西方社会在从“现代社会”向“后现代社会”转型的过程中,“上帝之死”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。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,也出现了某些“远离崇高”和“信仰缺失”的精神现象。

现代化带来了“迷心逐物”的现代病。人失落了信仰,也就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。无论社会怎么发展,无论经济怎么繁荣,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,大家都心浮气躁不思进取,心烦意乱不知所从,心贪气盛欲壑难填,社会如何和谐稳定,发展又如何协调持续?所谓“迷心逐物”,“心”既已“迷”,“物”何以“逐”?现代化改变着人类。无论东方西方,无论已“后现代化”还是在努力实现现代化,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——信仰重建。

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,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 200 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。现代科学的发展,地理大发现,民族国家的诞生等,都得益于文艺复兴中倡导的人本精神。文艺复兴把“人”从“神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,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,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,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。文艺复兴倡导的

人本主义的革新运动,开启了西方近现代自由民主的序幕,呼唤出强大的生产力,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文明波澜壮阔的景观。

但是,人类在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进步的同时,也正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其一,如前所述的“信仰迷茫”。由于经济活动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体,商业和科技成为了社会的核心价值。人类文明的一些终极价值以及各个文明的核心价值,都不能不从属于发展、效率和创新的现代价值,最终统一于科技和金钱,一切都成了经济和科学的附庸,一切都被市场化和科学化了。过去的宗教束缚解体现了,但代替宗教信仰的那些理念、那些价值,又将安在?

其二,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的关系空前紧张。随着文艺复兴以来生产力的大发展,“人”的作用空前放大了,可以上天入地,呼风唤雨,转化基因,试管婴儿……但解放了的“人”又过度膨胀了。今天我们看到的是,“人”对自然过度开发,环境污染破坏;“人”对社会为所欲为,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争斗越演越烈;“人”对“人”损人利己,尔虞我诈。

其三,当今世界“霸道”兴起。由于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,现代化也就常被理解为西方化。若干民族国家不断在器物、制度和观念上,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模仿西方。在这个过程中,文化的多样性正在伴随生物的多样性一样消

失。世界在表象上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同时,在本质上正在出现同质化。孙中山先生早前就敏锐地发现:“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?是科学的文化,是注重功利的文化……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,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‘行霸道’,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。但是我们……还有一种文化,好过霸道的文化,这种文化的本质,是仁义道德……要人怀德的文化,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‘行王道’。所以亚洲的文化,就是王道的文化。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,霸道大行之后,世界各国的道德,便天天退步。”“东方的文化是王道,西方的文化是霸道;讲王道

是主张仁义道德,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。讲仁义道德,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;讲功利强权,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。”

可见,文艺复兴极大地解放了“人”,但“人”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:文艺复兴使“人”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,之后人又被神化、异化。出路何在?一场新的“文艺复兴”,我将其称为新的文明复兴,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,呼之欲出。这场新的文明复兴,要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“和谐”的人,要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、人与社会和谐、人与人和谐的新的“和谐世界”。

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,因应着这个时代要求。英国的历史学家汤

因比说过,“避免人类自杀之路,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,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。”

什么“独特思维方法”?是天人合一,允执厥中,仁者爱人,以和为贵,和而不同,众缘和合。其核心,就是“和”。“礼之用,和为贵,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

“和”的精神,是一种承认,一种尊重,一种感恩,一种圆融。“和”的特质,是和而不同,互相包容,求同存异,共生共长。“和”的途径,是以对话求理解,和睦相处;以共识求团结,和衷共济;以包容求和谐,和谐发展。“和”的哲学,是“会通”,既有包容,更有择优;既有融合,更有贯通;既有继承,更有创新,是一以贯之、食而化之、从善如流、美而趋之。“和”的佳境,是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和美。

概而言之,“和”的根基,必然是精神的充实和信仰的重建。

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,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。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,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,发扬其积极成果又要革故鼎新。因为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,尊重人的本能欲望,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,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。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,新的文明复兴,将建造和谐的人。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,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。(本文是作者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太湖文化论坛的发言,编辑略有删节)

■地名里的传统

“僂”家村溯源

□柳如

今在山东惠民辛店乡境内有一村落,其村名甚是特殊,叫做“僂”(音同骂)家村。在中国浩繁的地名中,僂家村名可谓古往今来独树一帜:马添单人,骂去双口,标准地名,字典未有。

凡事总有其源头,据该村僂氏宗谱记载,“吾僂氏族原籍即墨岭山僂字注,大明洪武二年,奉召迁移至直隶枣强转移于惠民二籍”,始祖僂军佑,距今已有 638 年的历史。

而关于“僂”字的起源还有这样一段传说。相传该村从前叫骂家村,顾名思义该村有好吵骂、打群架、爱告状、打官司的陋习,对周围村落影响甚大,后来恶名相传,县官发了怒,大堂之上下令更名骂家村:去掉双口脱缰马,加上单人勒马行。于是将“骂”改为“僂”。此一改,果真村名变,村俗亦变。从此该村又逐渐形成了讲文明礼貌、团结友善、仗义行事和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。

如今该村人口达千,大都姓僂。与千年古城的先棣州村毗邻。几年前冬,先棣州村一村民耕牛夜间被盗,当该村的喇叭发出逮贼呼叫时,先跑出来逮贼的人多为僂家村的人,最终追出那村北三里地将牛抢回的还是这僂家村的人们,至今被传为佳话。

虽为独有的“僂”字村,但人们在使用中经常将“僂”误作“马”,这使得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“僂”字,面临着消失的境地。1984 年,在进行地名普查时,为尊重当地群众的意愿,从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,报经地名机构审批,国家地名管理机构备案,将这延续六百多年的僂家村名,正式标志在我国标准的地名地图册上。

如今,为将中华独有“僂”家村作为地名知识世代传承,“僂”字已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“僂”家村更名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地名故事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。

→感悟经典

“师道尊严”与“当仁不让”

□何中华

《礼记·学记》曰:“凡学之道,严师为难。师严然后道尊,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”这是说“道尊”的前提乃是“师严”,而“敬学”又依赖于“道尊”。俗话说“严师出高徒”,不无道理。只有严正方能生出尊严,而有了尊严才能使人产生由衷的敬畏。这便是“师道尊严”的由来。

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其《师说》一文中言:“师者,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在韩愈看来,教师的作用和意义是有不同层次的,他首先担当着传承道统的使命,其次是传授某种技能,最后是解惑释疑,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当然是道统的传递,亦即如宋儒张载所谓的“为往圣继绝学”。“师者”代表着文化的道统,是文化生命的人格化。在一定意义上,尊敬老师也就是尊重传统。说到底我们并不是尊崇和敬畏老师这个人,而是尊崇和敬畏他这个人身上所承载的文化血脉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,作为浓缩并积淀着文化传统之精神的人格化形式,师者受到人们特别的尊崇,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特有性格的内在要求。

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传承。从历史上看,它在总体上表现为一条线性的脉络,“源”“流”关系至为明显。中国文化不是横截面的,也不是断层式的,而是像一条纵向延伸、绵绵不绝的漫漫长河,虽历久而弥新。诚如《诗经》所言,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。所以,对于



“师道尊严”与“当仁不让”恰好形成一种张力关系,其中既实现了文化传统通过“师者”的尊严而延续和传承,亦维系了道德原则借助“当仁不让于师”的信念而获得的至上性。

中国文化来说,若是不深谙先秦典籍,不从源头上入手,就根本拿不到登堂入室的“入场券”。中国经学传统之所以发达,与此不无关系。经、传、注、疏、论、解、诂、勘、辨、雠、校、考……诸如此类的功夫,无一不是中国文化传播性特点演绎出来的结果。这一点同西方文化相比较,显得格外突出。西方文化的断层性相当明显,例如在西方哲学史上做出了划时代贡献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,并没有多么深厚的哲学史修养,却照样可以开辟一个哲学上的新时代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:“吾爱吾

师,但吾更爱真理。”这意味着“求真”比“尊师”更重要,因为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,即“真”未必一定依赖于“师”。

然而,中国文化的上述特点到了现代社会却遇到了严重挑战。海外学者林毓生认为,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讲求民主。民主当然有许多好处,但也有一个弱点,就是对传统的权威地位形成解构和腐蚀作用。大家知道,民主意味着平等。林毓生通过对美国的观察,认为在“一个民主绝对化的社会,一般人自然处处要求平等,什么事都要由自己来决定,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各种决定;否则就不民主、不平等。因此,各式各样从传统演变而来的权威都相对地遭受削减:父母、师长、学校、经典、教会,甚至语言规律都不再被信服,也不再被依靠”。在我们眼下的社会,人们甚至平等到了孩子对于父母可以直呼其名的地步。其实,这正是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出现文化认同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。比如,我们都强调师生之间关系的平等,其结果往往是淡化以至于遮蔽了由“师”到“生”的文化传递方向。横向关系瓦解了纵向关系。它使得我们无法充分地分享本该遗传给我们的古老传统,文化的承继功能因此受到极大的抑制,从而造成道统的断绝。这是导致现代社会人们价值观念混乱,以至于出现是非不分、善恶不明、好坏不清状况的重要原因。就这个方面来讲,“师道尊严”是有其不可忽略的文化价

值的。

当然,“师道尊严”并不是说学生在老师面前只能唯唯诺诺,甚至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,以至于丢掉自己的独立人格;而仅仅是说通过老师的尊严来造成一种对于传统的敬畏,对于文化有一种温情和敬意的了解。事实上,除此之外,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一条重要的补充,这就是孔子提出的“当仁不让”。按照《论语·卫灵公》的记载,孔子说过:“当仁,不让于师。”这表明,比“师”更重要的是“仁”,当两者发生抵牾时,我们宁愿放弃前者而保全后者。套用亚里士多德的“吾爱吾师,但吾更爱真理”,孔子的话可谓“吾爱吾师,但吾更爱仁德”。它告诉我们,在仁与不仁的选择上,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。哪怕是与老师的意见不相侔,亦须坚持道德原则而不屈从老师。

师道尊严”与“当仁不让”恰好形成一种张力关系,其中既实现了文化传统通过“师者”的尊严而延续和传承,亦维系了道德原则借助“当仁不让于师”的信念而获得的至上性。我们的文化传统,正是在这种相互矫正和彼此限约中,得以生生不息地发展和弘扬。(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)

